

语言生活皮书



C003

中国

Study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China: 2018

语言政策研究报告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组编

2018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语言生活皮书



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 (2018)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组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 2018/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7082-6

I. ①中… II. ①国… III. ①汉语—语言政策—研究报告—中国—2018 IV. ①H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369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2018)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组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7082-6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3/4

定价:59.00 元

组委会

主 任 杜占元
执行主任 田立新
委 员 张东刚 姚喜双 续 梅 张 力 曹德明
李宇明 彭 龙 王 刚 于殿利 仲伟合

编委会

审 订 陈章太 周庆生 潘文国 张浩明
名誉主编 李宇明
委 员 (按姓名音序排列)
陈 敏 戴曼纯 郭 熙 李 强 潘文国
苏新春 王建勤 王 敏 王 奇 王意如
文秋芳 杨尔弘 易 军 张日培 张治国
赵蓉晖 赵世举 周洪波 周庆生

主 编 张日培
副 主 编 潘 佳
编 者 (按姓名音序排列)
董洪杰 黄小丽 蒋冰冰 李 艳 林 皓
林元彪 刘思静 潘 佳 钱小飞 孙小春
徐默凡 徐欣路 于东兴 俞玮奇 袁 丹
张日培 张天伟 邹一戈

策 划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执 编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
学术指导 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

编写说明

《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是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的语言生活蓝皮书，通过对国内学术杂志、报纸及自媒体上以中文公开发表的语言政策研究类文章进行梳理、分类、遴选和摘编，介绍展示年度语言政策研究状况，服务政府语言决策、服务国家语言事业、服务学界语言研究、引导社会语言生活。本报告与《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状况报告》（语言生活白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语言生活绿皮书）、《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语言生活黄皮书）一起构成语言生活皮书系列，分别反映我国语言生活的学情、政情、社情，以及语言生活的世情。

本报告关注的语言政策研究包括针对语言问题的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方略研究和语言政策理论研究，内容涉及国家通用语普及、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语言资源科学保护、中华语言文化传承传播、语言教育、语言服务、语言产业等。

本报告2015年首次出版，曾用名《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发展报告》，2016年起使用现名。2015年至2017年，报告以研究内容为纲，比较全面地爬梳、摘编各内容板块下公开发表的论文或文章。自2018年起，报告设“事业篇”“热点篇”“理论篇”“参考篇”等，聚焦国家建设和发展战略中的语言问题、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中的学术问题、语言学界关注的政策性问题、语言政策与规划（LPP）理论的前沿问题、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中的热点问题等，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情况，分析展示年度研究新进展。

本报告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执编，在编委会指导下，组织中青年学者、特别是国家语委历次“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优秀中青年学者研修班”的有关成员共同编写。编写组全体成员抱持“向时贤致敬”的态度，广泛阅读、深入思考、精心提炼，在编制报告的过程中，得到了学术滋养，提升了学术视野。

《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2018）》设“事业篇”“热点篇”“理论篇”“参考篇”，就“新时期普通话异读词审音的原则与成果”“科学保护语言资源的内涵与举措”“华语的内涵与全球华语的发展趋势”“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中亚五国的‘去俄罗斯化’语言政策”等20个专题，在梳理已有研究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展示了2017年的研究新进展。编制过程中，得到了编委会全体专家及顾定倩、魏丹、黄友义、战菊等专家的指导与支持，特此鸣谢！

由于水平有限，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写在水头浪尖处

——序《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2018）》

“语言生活蓝皮书”（《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在连续发布三年之后，进行了全面改版：由文献摘编式嬗变为述评与摘编相结合；对年度学情全景扫描之时，突出热点，梳理发展脉络，综述带有评价。改版加大了成书难度，但反映了编者不懈探索、敢于担当的学者精神，也提升了蓝皮书服务决策、反映热点、引导趋势的学术功能。

编纂语言生活皮书，海内外无先例，无经典可援引，无范式可仿制。创新之物主要靠智慧运作，靠不断反思经验。在此创新的过程中，有三点是需要经常考虑的。

一 给谁看，影响谁

给谁看，影响谁，这是编书需考虑的首要问题。语言生活皮书意念上的读者群，有学界、政界和社会大众，皮书的语言和内容都要顾及这“三界”，评价皮书做得到不到位，也主要看这“三界”的反映。

（一）学界

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主要在学界，故而《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首先是为学界而作。学界可析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者。他们是本领域专家，对诸多问题都有深邃思考及独到见解，但不一定有时间把本领域的文献都读完看遍。蓝皮书应是这些学者的眼、耳、手，帮助他们收集资料、分析文献。

其二是不做本研究的语言学者。他们通过蓝皮书可以快而全面地了解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而关心这一领域的研究,支持这一领域的研究,乃至转入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国目前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者,几乎都从另一学域转来。对这些语言学者,热点及评论所起作用较大,热点引发其兴趣,评论诱发其思考。有兴趣、有思考,就可能想做点这方面的研究,成为票友。票友做久了,就可能下海成为台上正角。

其三是语言学之外的其他学者。语言政策与规划本就是跨学科研究对象,多学科联袂合力,方能把它研究好。只有语言学家研究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常患“营养不良”症。学科间的横向辐射是近半个世纪的科学新动向,“学科互济、学科互动”已成国际学界常态,不同学科,甚至连文理学科之间都能形成共同的学术追求,可以共享学术成果。一个学科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材料,马上就会被相关学科吸收利用。某一领域、某一学人的发现马上就可能成为整个学界的科学思考。不同学科甚至会通力合作,验证某种假说,解决某些问题。因此会产生乔姆斯基现象、哈贝马斯现象。

但在我国,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就是一个学科内也常画地为牢,实难沟通,一位学者、一个领域、一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不管多么丰硕,都难以推进整个中国科学向前发展。语言学当然不例外,相关学科对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关注不多,语言学对相关学科的实际影响也不大。若说我们与国际学界有差距,“学科互济、学科互动”方面的差距最大。蓝皮书如何考虑非语言学专业的兴趣与需求,如何影响相关学科,打破学术壁垒,建立学科联动,尚需用些心思。

当然,现在的学界已不能拘于国境线,海外学者也应列入蓝皮书的读者群。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包括建立人类的学术共同体。在选材、评论、用语等方面,一定要有海外意识,有国际视野,有理论自觉,要通过蓝皮书来塑造中国学界形象乃至中国形象。

(二) 政界

政界是语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语言政策研究成果之一用就是资政。蓝皮书怎样照顾政界这一读者群,发挥资政作用,也需多思考,多探索。

近20年来,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语言文字工作已有数件。首件就是《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这部法律一直被称为“没有牙齿的老虎”，甚至连法律界都很少有人知道这部法律，但是，几届国家领导人都重视它，特别是在处理民族地区的语言问题时，常常引用它。其次就是“语言扶贫”，已经列入国家扶贫的重要举措。在国家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语言文字工作能够为扶贫脱贫贡献绵力，也是幸事。我国的语言经济学发展较晚，如今也是个发展的好机遇，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可使语言规划具有更好的经济学视角。

2014年6月5日至6日，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州联合召开“世界语言大会”，形成了关于语言能力的《苏州共识》。2018年9月19日至20日，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长沙联合召开“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发表了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的《岳麓宣言》。这表明中国语言规划的理论 and 实践开始发挥世界影响。

其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语言扶贫、语言能力、语言资源保护等，都是在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国家行为的，是学术发挥资政作用的几个范例，也是着力打造学界与政界的智力“旋转门”的成果。

（三）社会大众

近些年，人们把我们这些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学者，称为“语言生活派”。语言生活派的基本主张，就是关注语言生活，关注国家进程中乃至人类发展中遇到的现实语言问题。其学术目标可以概括为两句话：提升个人和国家的语言能力，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语言生活不仅是学界研究之事、政界关心之事，更是社会大众的切身之事。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不仅要惠学资政，更要服务社会大众。语言学，特别是语言规划学，不只是工作室、实验室里的学问，更是现实生活里的学问。作为学者个人，当然可以选择“象牙塔”，但作为一个学科，不能不关注语言生活，不能不从语言生活中去选题立项，不能不去解决语言生活问题，否则就会丧失学术的社会职责，也会丧失学术发展的原动力。

把社会大众作为蓝皮书的读者，不仅讨论的问题要“接地气”，要具有社会兴奋点，而且也要探索如何用社会话语表述学术研究成果。现在的学术论文，话语欧化极为严重，许多论文连语言学行内人读来都困难，何况语言学的行外

人。学术论文与社会话语是有差别，但差别大到严重影响阅读的地步，就是较为严重的“文风问题”了。这也是蓝皮书的编者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二 评价什么，如何评价

蓝皮书对本年的学术研究不仅要有全景扫描，还要有所评价。评价反映着编纂者的立场与见识，寄托着编纂者的旨趣及欲施加的影响。

年度研究热点自然是评价的重点。要描述热点现象及其已有热度，分析热点产生的原因，揭示学术热点与语言生活热点的关系，预测热点的发展趋势，指出研究热点的理论收获、学术史意义以及实践价值。

同时要特别关注学术创新点。学术创新或是有新材料，或是有新方法，或是有新观念，或是有新阐释，或是有新用途。学术创新点可能不是热点，可能有许多不完善，但却弥足珍贵。发现学术创新，特别是学术原创，需要敏锐的眼光，需要宽容的胸襟，甚至还需要有“唯新是举”的胆略。

关注热点和创新点的同时，也要关注年度研究的“弱点”。所谓弱点，主要是指一些重要的本该多着笔墨的研究领域，却研究较少、成果较弱。所谓重要的本该多着笔墨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语言生活的热点问题、语言规划的重要方面、学术上急需完善的环节、国外有较多研究的领域等。特别是语言生活热而研究不怎么热的地方，例如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国际语言冲突问题、汉语国际教育低龄化问题、中国的外语生活与外语教育问题等。

在语言学界，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还是薄弱领域，研究队伍及成果还无法对国家语言政策的实施与完善进行有力的全方位的学术支撑，对整个社会的语言意识的影响也远不到位。纵向看，我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有了不小进展，且也发挥了不小的助学资政作用，但是总体上说，我们的研究还是自发的、零散的、兴趣性的。如何组织学术队伍，加强学科建设，加快人才培养，提升研究品味，也应当给以评价。一个学科的声望和价值，来自学科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品位。

语言政策不是国家政治的简单演绎，它还要受到历史传统、社会语言意识和语言生活的制约。好的语言政策必须符合语言生活实际，并且能够指引语言

生活的和谐发展。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也不是对语言政策的简单阐释,起码有三个方面的任务:(1)考察已有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活的切合度,及其对语言生活的指引力;(2)据此提出语言政策的维护、完善建议;(3)根据语言生活的发展探究新的语言政策。

1949年以来的国家语言政策发生了不小变化。由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发展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和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制化,再发展到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这些变化,都是研究在先,实践在先。蓝皮书要鼓励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蓝皮书在年度评价之时,也可以提出语言政策调整完善或是制定某一语言政策的建议,甚至是具体建议内容。这些具体建议的内容可以叫作“学术蓝本”,若其的确可行,就会经过一定程序发展为语言政策。

三 问题意识, 前瞻眼光

蓝皮书不仅要全面真实地反映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更要引导其研究,这就要求其编纂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前瞻眼光。这种问题不仅是研究呈现的热点问题,更应当是语言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是国家和人类发展中的重要语言问题,是“水之头”“浪之尖”上的问题。“水头”就是时代潮流之“头”,“浪尖”就是问题聚集处、矛盾交织处、思想交锋处。

比如,我国最近在国际上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的理念,一些新的学术问题也随之而生:语言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全球语言生活需要如何治理?这便是“水头”处的问题。

觉察到“水头浪尖”处的问题、能够评说“水头浪尖”处的问题,是需要前瞻眼光和学术功力的。皮书编纂者要通过开会与讨论广集智慧,增强眼力,增长功力。比如汉语国际教育,除了人们常谈的问题之外,还起码有四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汉语国际教育低龄化问题。许多数据表明,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低龄人群已经占比50%—60%,而现在的汉语国际教育基本上是成人教育体系,在教师、教材、教育方法等方面,需要一系列的重大转变。

第二，汉语学习之后的汉语生活。我们现在比较关心有多少人在学汉语，但很少关注汉语学习之后人士的汉语生活，比如有多少人还在用汉语做事情？他们使用汉语还有哪些困难？还需得到哪些帮助？学习汉语是个过程，应用汉语才是目的。而我们只关注过程而不关注目的，说来挺奇怪的。

第三，智慧学习。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语言学习的手段、场合、理念、目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利用互联网、微课程和伴学机器人，开启智能学习新时代，这是时代应有的新话题。

第四，汉语国际教育在人类语言生活中所扮角色。跨国跨文化的语言交流，可以促进人类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是人类语言生态多样性的需要。世界上有十余个语言文化传播机构，如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韩国世宗学堂等，都在帮助人类形成多样化的国际语言生活。如果放在人类语言生活格局中考察语言国际传播，那么汉语国际教育应秉持什么理念、采取什么样的方略呢？

汉语国际教育应当是处在“浪尖”处的语言问题。不能仅仅讨论教学等技术问题，也不能钻入国际上某些人设置的话语套子中，而应当有些新角度，说些新话语，提些新建议。而要有这些“新”，便需要学术眼力和学术功力。

此类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外语教育规划、家庭语言政策、抢险救灾中的语言问题、语言与智慧城市建设、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开展语言政策与规划方面的研究，更需要蓝皮书去促进、引导这些研究，把文章做在“水头浪尖”处。

李宇明

序于2018年10月1—4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事业篇	001
新时期普通话异读词审音的原则与成果.....	003
化学元素中文命名的原则与方法.....	015
手语规范化与国家通用手语研制.....	029
科学保护语言资源的内涵与举措.....	040
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及其法律保障.....	061
语文核心素养的内涵及其教学实践.....	078
外语非通用语人才培养.....	093
英语能力评价与等级量表研制.....	116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133
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	148
第二部分 热点篇	171
华语的内涵与全球华语的发展趋势.....	173
台湾语言政策与两岸语言关系.....	190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孔子学院研究.....	203
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	216
语言产业的理论探讨与发展战略.....	232
第三部分 理论篇	249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	251
语言景观研究.....	274
继承语研究.....	291

第四部分 参考篇.....	309
---------------	-----

中亚五国的“去俄罗斯化”语言政策.....	311
-----------------------	-----

多语制下的欧盟机构语言政策和欧盟法律一体化.....	328
----------------------------	-----

第五部分 附录.....	341
--------------	-----

2017 年语言政策与规划类书目	343
------------------------	-----

《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8)》目录	345
------------------------------	-----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目录	348
----------------------------	-----

《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目录	350
----------------------------	-----

第一部分

事业篇

新时期普通话异读词审音的原则与成果

普通话词汇中，有一部分词（或词中的语素）在习惯上有两个或几个不同的读音，这些词被称为“异读词”。异读词反映了普通话的语音歧义现象，对其读音进行审订，是普通话语音规范的重要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开展了三次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工作。（1）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形成《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的正编、续编、三编，于1963年汇集成《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简称《初稿》）发表，共审订异读词1800余条。同期，还审订了地名读音，发表有《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共审订地名读音170余条。（2）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工作是对《初稿》进行修订并定稿，于1985年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简称《审音表》）。（3）第三次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新时期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工作。“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就开始酝酿并开展了相关学术准备工作，2011年正式启动。主要任务是对《审音表》进行修订，目前可见的成果是2016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简称《审音表（修订）》或《修订稿》）的“征求意见稿”。

普通话审音工作跨度60年，每一次推进均与时代需求相适应，解决了语言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都多少存在一些不足。各时期的研究成果在述介每一次审音成就的同时，也都伴随着对这些不足的反思与讨论，主要形成了以下研究热点。

——审音理念。有两个关系密切的核心话题。（1）“从理”与“从俗”的关系问题。历次审音工作中的不足，有的是“从理”未坚持，如“螯”字的定音（厉兵1992）；有的是未照顾语言使用的客观事实，如王红旗（1998）所谓的“规范过度”。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一五”重大专项课题“普通话审音工作宣传与意见征集研究”（简称“课题”）在辞书界和教育界的调查结果显示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分歧：辞书界认为应从语音现实出发的观点居多，教育界“遵循音理”的意见比例较高。对此，石锋和施向东（2012）、孟蓬生（2016）、钟英华和张洪